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Karl Marx

民主化的进程

Democratization

[匈] 捷尔吉·卢卡奇 (Georg Lukács) / 著

张翼星 夏璐 / 译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民主化的进程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匈牙利] 卢卡奇 (Georg Lukács) /著

张翼星 夏璐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化的进程 / (匈) 捷尔吉·卢卡奇著；张翼星，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13-7

I. ①民… II. ①捷… ②张… ③夏 III. ①民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403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民主化的进程

[匈] 捷尔吉·卢卡奇 (Georg Lukács) 著

张翼星 夏璐 译

Minzuhuax de Jinc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0.7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4 00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 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 世纪末，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中文版译者序

应当借鉴卢卡奇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

张翼星

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是匈牙利现代卓越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20世纪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中，他起到和产生过巨大作用和影响，也经受过严重曲折和磨难，但他始终密切关注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探索。他一生的理论活动，不仅具有跨越多种学科的特点，而且是沿着愈来愈成熟的方向发展的。如果说，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他早期的成名作，带有过渡性和两重性的特点，曾在国际上引起诸多争议，那么，他晚年形成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审美特性》和《民主化的进程》三本著作，则标志着他理论上的重大进展和臻于成熟。他晚年理论探索的主旨，也是他晚年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和倡导的重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在20世纪60年代末，依据对社会主义实践和体制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他认为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他晚年的三本著作，看来形成了一个整体，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他最后集中探索的理论成果。《社会存在本体论》与《审美特性》，是试图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基本理论，推动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民主化的进程》则是着重阐明和倡导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卢卡奇认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是马克思主义革新的政治前提，而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又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理论保证。

卢卡奇晚年的三本著作，既是他一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逻辑结论，又是他对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连续发生的重大历史现象，也是当代国际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普遍的历史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和卢卡奇所在的匈牙利，都曾先后进行改革的试验，走上改革的道路。60年代，这种改革扩展到东欧的一系列国家，苏联也曾步入缓慢而起伏的改革进程。到卢卡奇晚年写作三本著作时，改革已经经历了一段并

不平坦的道路。改革的突出任务，是要打破在苏联形成而推广到一系列国家的那种高度集中、过分强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并且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和民族特点，探索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这已形成一种强大的历史潮流。卢卡奇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就已站在这种潮流的前列，积极支持改革，而且他认为，改革的深入发展，必须以革新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济的发展，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拱顶石，但经济和社会的其他方面是不能分割的。因此，不仅经济体制需要改革，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也需要相应的改革；不仅经济学需要革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需要革新。卢卡奇正是依据这种改革的要求和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善、创新相结合，对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集中反映在《民主化的进程》一书中。

《民主化的进程》写于 1968 年 3 月至 11 月。卢卡奇在 1968 年 9 月 2 日致弗兰克·本塞勒博士的信中说：“我的脑际时常有一种想法，写一篇长文论述现代民主化（包括两种制度）的社会本体论。”这篇长文是在 11 月末完成的，原来的标题是：“民主化的今天和明天”。作者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考察民主的现在和未来，估量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中实现的可能性。他要求尽力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实现民主化的机会。

对民主问题的关注，贯穿在卢卡奇一生的理论著述活动中，这与他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是密切联系的。1922 年，他曾发表《再论幻觉政治》一文，激烈地谴责党内官僚化和权力主义的滋长。1939—1940 年，他在《国际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人民领袖还是官僚？》的文章，这是斯大林时期在苏联发表的最尖锐而透彻地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苏共二十大之后，凭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实践，结合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更加明朗化了，这使得他到晚年能够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民主化的进程》的全部手稿直到 1985 年才在德国正式出版。1991 年出版了第一个英译本（由美国学者诺曼·莱文翻译。中译本就是根据莱文的英译本译出的）。他一直认为，民主化问题是与社会主义的深远的历史使命息息相关的。

在这里卢卡奇着重论述的问题是：

一、如何看待民主的历史类型

卢卡奇的民主观基本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民主的类型及其

兴衰奠基于经济结构之内。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虽然涉及民主及其形式的多样性，但不能认识民主制度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马克思才是从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的第一人。

卢卡奇指出了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民主类型：一种是古希腊时期城邦民主制，这种城邦的成员是民主的积极参与者。这与部分土地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城邦民主制随着其经济基础的分解而消亡。另一种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以法国革命为典型，受到希腊城邦民主制理想的影响。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其自由、平等的基本模式，仍然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卢卡奇指出，商品“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与自由的现实基础”。这种民主制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它包含着一切固有的矛盾，但仍然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与城邦制民主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是以私有制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和商品贸易的世界，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上层建筑。宪法承认物质资料生产的私有制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是利己主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同时，卢卡奇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是虚伪的，在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占有的范畴达到了顶峰，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的理想形式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利己主义目的进行阶级利益调整的工具。因此，资产阶级民主决不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现实的选择。他指出，选择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出路的任何企图，只是徒劳无益的幻想，只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解体。可见，卢卡奇是不主张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的。

二、社会主义的“危机”是怎样发生的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大致相同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何在？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人深思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所谓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斯大林时期出现的各种制度、倾向、理论、策略的总和造成的。苏共二十大对这种危机作过表述，并且为了克服这种危机而开始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但是，苏共二十大把危机的原因又主要描述为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有人很快就对此提出异议，比如意大利共产党前总

书记陶里亚蒂，便反对把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特征看作社会主义深刻危机的最终原因，要求对斯大林时期的问题作出社会历史的分析。

那么，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究竟何在？卢卡奇认为，这首先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非经典”的性质相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首先在一系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这原是一种“经典”性的设想，但历史却走着奇特的路。十月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发生的，后来又在亚洲和东欧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这便表现为“非经典”性。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指责俄国十月革命通过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种“早产”或“错误”。卢卡奇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当时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与广大人民群众解决两个问题（战争问题与农民问题）的迫切愿望是一致的。只有尽快结束世界战争，才能使群众摆脱苦难的深渊；只有彻底避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才能使农民获得解放。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虽然并不直接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并没有克服“非经典”性的经济问题，但却意味着广阔意义的革命形势，实际上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卢卡奇看来，俄国十月革命和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非经典”性，突出地产生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二是民主问题。在革命取得胜利和结束战争之后，就应当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发展民主。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决定论与目的论的辩证统一。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觉能动性是相互促进的。这个经济发展与民主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或者说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还不可能提供理论的解决。随后，包括列宁在内，也没有谁从理论上给予系统的阐述。但是，列宁的目光，是同时注视着这两个方面的。因此，在战争基本结束之后，列宁便把经济建设看作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列宁怀着疑惑和焦虑的心情思考着如何解决官僚政治的问题。卢卡奇认为，被称为“列宁遗嘱”的最后通过口述形成的著述，是已知的最有悲观色彩的历史文献。其中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关切，关于民主建设的构想已见端倪。然而，列宁的后继者们却中断了列宁的思路，再也没有人在这方面奉献自己的才华与精力，而只在一国能否保持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回答中，贯穿着权力斗争，并且陷入经济主义的泥潭，忽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方面。似乎在生产资料国有化之后，无产阶级专政就提供了对复杂问题的一切本质的回答，似乎肯定了一国完全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就代替了对俄国革命的“非经典”性问题的回答。这样，逐渐使斯大林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僵

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得以形成，这正是社会主义危机发生的原因。这个问题，直到苏共二十大时，仍未得到解决。因为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虽然频繁而激烈地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经济主义者，只考虑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而政治与民主的前提，却都在他的视野之外，因此，他仍然把自己局限在斯大林主义的范围之内。

卢卡奇的这种分析，显然总结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并试图恢复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这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三、怎样分析斯大林的错误

对于斯大林的错误，卢卡奇有一个认识过程。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别，卢卡奇对待斯大林思想的态度，前后确实有所不同。总的看来，在侨居苏联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卢卡奇在政治上对斯大林的路线、政策表示了基本支持的态度。特别是在与法西斯力量决战的时刻，他更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认为必须无条件地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党团结一致，把这种团结看得高于一切。他认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比理论、政治、思想上的某些分歧和争议更为重要。实际上，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卢卡奇坚决支持了斯大林的路线的主张，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正如他在 1957 年所说：“斯大林曾反对托洛茨基，胜利地捍卫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在社会主义发生内部危机时拯救了社会主义，这一切功劳是很大的。”^①

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又明确地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他指出，斯大林为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因十月革命的“非经典”性而形成的弱点。苏联曾经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和重要的经济力量，而且没有在基本原则上向资本主义妥协。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只是在苏联发现自己的敌人，这个敌人会以最大的牺牲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达到完全消灭对手的目的。斯大林虽然有个别事件上有不少策略性的错误，但他使苏联成功地发挥了它作为世界和平维护者的作用，在短期内能够生产它自己的原子弹，形成核对峙，对于有效地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遏制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是有重要意义的。卢卡

^① 《卢卡奇自传》，231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奇曾经明确地指出：“以为斯大林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则纯粹是一种偏见。”^①

但是，长期以来，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卢卡奇的思想与斯大林的思想是有着原则分歧的。比如，在革命纲领和政权组织形式上，早在 1929 年他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布鲁姆提纲》中，就没有按照斯大林的主张去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要求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依据列宁的思想，结合匈牙利的革命实际，主张实现列宁在 1905 年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目标；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策略上，由于法西斯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崛起，斯大林把西方的某些社会主义的主张和资产阶级民主都谴责为只是可供右的极权主义选择的形式，卢卡奇则要求探寻一条不同的途径，把民主看作对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防御。斯大林曾把社会民主党人描绘成法西斯分子的“孪生兄弟”，拒绝与之联合，卢卡奇则要求联合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各种民主力量，建立“人民阵线”，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侵略；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上，斯大林建立高度集权的体制，卢卡奇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反对过分集中和极权主义，而主张广泛联合各个民主阶层，把社会主义民主贯彻在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在文艺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卢卡奇积极倡导文艺创作中的自主性，反对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反对单纯以意识形态作为衡量艺术和美学成就的标准，同时，他主张贯彻能动的反映论和现实主义，反对单纯模拟生活的自然主义观点；在对待哲学史遗产的态度上，当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把黑格尔思想简单地判定为对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时，卢卡奇则坚持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发掘黑格尔思想的合理方面，他于 1938 年写成《青年黑格尔》一书，着重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与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经济问题的关系。由于与斯大林的观点大相径庭，这部书稿直到 1948 年才在苏黎世出版。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卢卡奇更加深入地思考了斯大林问题，公开地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是，他没有为国际上那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浪潮所左右，而是在肯定斯大林的某些功绩和贡献的同时，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和批判。当不少人囿于个人恩怨，把斯大林的错误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归咎于个人品质，甚至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时，卢卡奇却冷静地把斯大林问题看作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过程来考察，着眼于揭示斯大林错误的实质和方法

① 《卢卡奇自传》，130 页。

论根源，以便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向前发展。

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对斯大林方法论的错误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首先，斯大林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实行“策略至上”的原则，把策略上的需要置于首位。卢卡奇认为，这种错误实质上是采纳资产阶级的所谓的“现实政治”的观点。因此，这不仅是俄国或斯大林主义的问题，而且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内部某种占支配地位的倾向。斯大林把经济学曲解为一门专门的实证主义科学，要求把社会主义建设单独集中在工业的发展上，完全忽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忽视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同时，在经济学方面，斯大林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也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他混淆了价值规律本身及其呈现在商品交换中的现象，把价值确定为商品交换，而马克思则是把价值的实体确定为劳动时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也继续存在，如果剥夺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那么，剥削就仍然是可能的；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条件下消灭了商品交换，也就消灭了剩余劳动，因而剥削就不可能存在。在卢卡奇看来，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提供了舆论根据。策略至上的另一个例证，是在国内政治方面，斯大林制造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日益尖锐化的理论，他不是从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为了战胜自己的对手，从对布哈林等人采取特殊情况策略的需要出发，在采取了这种策略之后，再炮制某种论点去论证。

其次，斯大林把马克思与列宁的方法论原则简单化甚至庸俗化了。卢卡奇指出，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辩证法的定义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本已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提供的，都不过是某种简单化的几个“特点”。这种东西在 30 年代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哲学的替代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上，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特别是西方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果，而斯大林则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各国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把它限制为无产阶级的经验。在卢卡奇看来，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它的文化遗产和思想先辈，那么它就会与广阔的人道主义相分离，并且失去它的较高的目的。斯大林企图排除哲学史上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通过日丹诺夫把黑格尔说成是对法国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为脱离西方哲学遗产的某种孤立出现的思想，似乎在资产阶级和以前的世界中

没有任何先驱者，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和庸俗化。

卢卡奇认为，苏共二十大的积极成就，在于发动了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但它的弱点也在于这种批评仅仅是部分的，只集中于表面问题上，并未切入斯大林主义制度的核心，对个人迷信的批评不是不正确，而是不全面、不深入。在卢卡奇看来，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不能归结为个人极权主义或对法律原则的毁坏，斯大林主义制度仍然根源于经济问题，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后果，核心问题涉及“原始积累”。就是说，在快速工业化的情况下，经历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在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方面，斯大林主义制度有其成功之处，但当生产发展到一个特定的水平，所生产东西的质量和提供服务的优质性的问题就出现了。斯大林企图用过时了的政治方法来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只顾集中发展重工业，对人民消费的需要漠不关心。集中的官僚主义计划机构越是僵化，就越是难以在量和质方面适应消费者的普遍需要，政治统治的局面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可见卢卡奇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批判，是比较客观而全面的，这与单纯的政治性谴责，或单纯归咎于个人品质、个人崇拜的批判相比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批判，是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分析，因而较深入地触及错误的性质和根源，有利于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防止和避免类似的历史现象重演。

四、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根据和特征是什么

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运用了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概念，如市民社会、类存在和人的目的性活动等，试图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化体制作出哲学论证。在这里，卢卡奇对政治和民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上，而是着眼于市民社会和人的类存在。在他看来，政治的概念，广义地说，是对社会争议的裁决，是社会作出协议的要求。因此，政治是社会永远呈现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着阶层、集团的社会，个人、阶层和集团之间的争议总是需要裁决的，而裁决就要达成某种协议。民主就是要保证这种裁决能为大多数人接受，这种协议能成为大多数人控制的途径和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在解决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之后，或者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之外，民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显得十分迫切。这就是卢卡奇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化的主要原

因。卢卡奇认为，民主的深化并不寓于社会的平均分配之中，而是寓于社会的个人、阶层和集团的合理协议之中，卢卡奇像马克思那样，相信市场社会的政治化，因为市民社会是人类日常生活直接而顺当的表达，政治是一切市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职能。在卢卡奇看来，巴黎公社或苏维埃一类的制度，就是这种市民社会政治化的合适制度。这种制度呈现出来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上下的直接沟通和实践中互相适应，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代议制民主或议会结构的形式主义。但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组织形式，都是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由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地自发兴起的，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不可能再恢复这种组织形式了，必须开创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途径。

1. 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根据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已去世，没有为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留下清晰的大纲，完整的民主的意识也不可能在居民中自发地形成。在卢卡奇看来，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社会结构与自觉的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民主，既是客观的政治体制，又是人的自觉活动的工具。

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强调人的能动性的人类学思想，用来阐述民主的概念。他不再从劳动的数量上着眼，不再思索民主与商品价值学说之间的联系，而着重思索人的能动性的需要，要求从质量上开辟一条充分发动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促进人的才能或潜能的增强和发挥。由此，卢卡奇批评了拉萨尔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拉萨尔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对劳动的不折不扣的补偿”。斯大林把社会主义说成消灭剩余劳动，完全忘记了剩余劳动对社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两种观点都把社会主义归于单纯的经济。卢卡奇则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定义，他不把商品的丰富而把民主的实现置于首位，从而把社会主义确定为保证实现比较充分的民主的唯一途径。

卢卡奇运用类存在的概念，从实质上对比了社会主义的劳动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劳动的人化，意味着通过工具的创造，人能够适应于现存的或新引进的劳动方式。劳动条件的改善，是增加生产的手段，目的是要增长剩余劳动的剥削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人化则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人的劳动方式必须符合人的类存在，而人的类存在的能动性便成为创造劳动条件的指导原则。他指出：“这种类存在的自我活动有可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据而起作用，可能成为自由王国的准备，尽管走向自由王国的旅程很长，并且充满着矛盾和暂时的障碍。”